

论朝鲜文人的文化心理及场域呈现

——以崔溥《漂海录》中的诗词观念为例^{*}

樊 葵

【内容提要】 朝鲜文人崔溥于明弘治年间漂流至浙江台州，返国后撰《漂海录》。在书中崔溥表现出某些轻视诗词创作的观念，而事实上，崔氏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学基础，对于当时明朝与朝鲜使节往来之诗词唱和亦非常熟悉，其本人也能创作汉诗。通过多维透视这种观念与文学实践的矛盾性，可以探究中国文学的传播、影响以及朝鲜文人复杂的文化心理，从而展现以中国文学为参照系、根据具体场域来考察研究域外文学的重要性。

【关键词】 崔溥 《漂海录》 诗词观念 文化心理 场域

【作者简介】 樊葵，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明孝宗弘治年间，朝鲜国官员崔溥自济州乘舟出发返乡奔丧，途中因风漂至浙江台州三门一带，上岸后由地方官员甄别并护送至北京，经辽东返国。崔溥归国后，奉朝鲜王命作《漂海录》五万余字，以目录的形式，记载了他在中国的行程以及和众多官员、士人的交往活动。其内容“涉及明朝弘治初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以及市井风情等方面的情况，对于研究我国明代海防、政制、司法、运河、城市、地志、民俗以及两国关系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韩国古代词文学及全集笺注”（项目编号：15AWW001）的阶段性成果。

等，堪为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典籍”。^① 崔溥的《漂海录》作为异域藩属国官员所撰目录，提供了一个观察明代社会的“他者”视角，较之传世中国文献的“主体”视角，这种“他者”视角有重要的补充和反观意义。而其中关于诗词文学的若干交谈记录，则反映了崔溥的文学观念，并折射出朝鲜文人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某些文化心理，这一点亦是值得观照的问题。本文拟以此为例，就崔溥关于诗词创作的观念进行分析，进而探究其背后的文化心理、交流场域等问题，或可为理解古代东亚文学、文化传播提供一些新的视角。

一 崔溥《漂海录》中的诗词观念

崔溥（1454～1504），字渊渊，号锦南。生平略见其外孙柳希春所撰《锦南先生事实记》：

二十四，中进士第三。……筮仕立朝，累官为典籍，参修《东国通鉴》，著论一日数十首，明白的确，大为时论所推诵。丙午，中重试第二，自司宪府监察为弘文馆副修撰，寻升修撰。丁未，升副校理。九月，以推刷敬差官往济州。弘治戊申闰正月，闻父丧，遑忙渡海，遭风漂至中国之台州。六月，回到汉阳青坡驿，承上命撰进《漂海录》。厥后连丁内艰。壬子正月，免丧除持平。谏官以前日初丧应命撰录为过而驳之。上以其议为太深，御宣政殿引见，问漂流首末。公细陈榻前。上嗟叹曰：“尔跋涉死地，亦能华国。”乃赐衣一袭。^②

崔溥的著述除《漂海录》之外，只有数量不多的几篇文章传世。柳希春在隆庆年间所辑录的也很有限：“先生既酷没，又无嗣子，其平生著述散亡零落，十无二三。希春收拾于六十年之后，仅得疏记碑铭七首并《东国

^①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初探》，载氏著《崔溥〈漂海录〉评注》，线装书局，2002，第1页。

^② [朝鲜]柳希春：《眉岩集》卷3《锦南先生事实记》，《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第34册，第194页。

通鉴论》一百二十首为二卷”。^①

据《漂海录》所载，崔溥在浙江登岸后，被护送北上，途经各地均与当地官员或文人有所往来，其间难免涉及谈文论艺或诗词唱酬之事。可是《漂海录》中，崔溥在谈及自己的诗词创作时，却一概表现出对诗词创作活动的轻视甚至蔑视态度。如其中记载崔溥在海门卫桃渚所与王碧、卢夫容等人的问答云：

其人又问曰：“你作诗否？”臣答曰：“诗词乃轻薄子嘲弄风月之资，非学道笃实君子所为也。我以格致诚正为学，不用意学夫诗词也。若或有人先倡，不得不和耳。”^②

又崔溥在姑苏驿与王、宋二御史的问答云：

当午，有按察御史二大人，姓王若宋者来驿中，待我礼宾馆，问：“你官何品？”臣对曰：“五品官。”又曰：“你能诗否？”臣曰：“我国士子皆以经学穷理为业，嘲弄风月为贱，故我亦不学诗词。”^③

这两段记述如出一辙，是对于不同的询问者关于“作诗否”“能诗否”的回答。细绎崔溥之语，约略可见四层意思：其一，诗词乃轻薄子之事，非学道笃实君子之所为，这是从创作者角度对诗词的否定性观念；其二，诗词乃嘲风弄月之资，非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学，这是从创作内容角度对诗词的否定性观念；其三，朝鲜士人均持上述观念，这是从朝鲜国文人的普遍性角度对诗词的否定性观念；其四，故我不学诗词或不用意学诗词，偶有所作，亦因他人先有所作，不得不唱和而已，这是从其本人的个体角度对诗词的否定性观念。

由此可见，崔溥在总体上表现出对诗词创作的否定性态度，认为其体甚卑，厥品不高，有碍于穷理或修身，故不足为之。

① [朝鲜]柳希春：《眉岩集》卷3《锦南先生事实记》，《韩国文集丛刊》，第34册，第195页。

②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第59~60页。

③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第106页。

二 崔溥的诗词观与文学实践的矛盾性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作品及其文学传统很早就东传进入朝鲜半岛并直接影响东国文人的文学创作。就诗歌而言，从统一新罗时代到高丽王朝，通过各种传播途径，唐宋诗歌中的名篇佳作已在朝鲜半岛流播；就词而言，至少在高丽宣宗之前，唐宋词乐及词作也开始了在东国的传播和唱和。自高丽光宗朝开始的科举，完全承袭中原王朝的制度，亦以诗赋取士。高丽的士子们与中国士子一样，精通诗艺是基本条件，仅有高下之别，而无能否之异。高丽宫廷中诗赋创作之风亦盛。如成宗十四年（995）春甚至特别下教云：“予恐业文之士，才得科名，各牵公务，以废素业。其年五十以下未经知制诰者，翰林院出题，令每月进诗三篇、赋一篇。在外文官，自为诗三十篇、赋一篇，岁抄附计吏以进，翰林品题以闻。”^① 在这样的要求下，从士子至文官，无不需要精研诗学。高丽王朝的文人中，李奎报、李齐贤各在诗歌创作和词体创作方面达到极高的水平，可视为东国文学的高峰。在朝鲜王朝建国之前，中国诗词文学的不断传播使得诗词传统早已深植于海东，且成为朝鲜文人知识背景的建构要素之一。流传至今的上百部朝鲜文人诗文集和总数近两千首的词作，就是明证。由此观之，朝鲜士人的创作实际，与崔溥对于诗词创作的否定性观念是存在矛盾的。

即使从崔溥的个体角度视之，其观念与其诗文实践也有着现实的矛盾性。其一，崔溥本人对于中国传统的诗词文学非常熟悉。虽自称“不学诗词”，但中国行程中所见所闻之风景地名，都能让崔氏立刻联想起中国传统的文人典故或诗词文作品。如《漂海录》卷2记其在绍兴：

兰亭在娄公阜上天章寺之前，即王羲之修禊处。贺家湖在城西南十余里，有贺知章千秋观旧基。剡溪在秦望山之南嵊县之地，距府百余里，即子猷访戴逵之溪也。^②

^① [朝鲜] 郑麟趾：《高丽史》卷8，成宗十四年，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3，第79页。

^②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第86页。

又同卷记杭州云：

竹阁在广化院，白乐天所建。乐天诗“宵眠竹阁间”者此也。岳鄂王墓在栖霞岭口。冷泉亭在灵隐寺前飞来峰下。古志“许由尝饮于灵隐涧”者此也。表忠观在龙山南，有东坡所撰碑。凤篁岭在放牧马场西，即东坡访辨才之处。南屏山在兴教寺后，崖壁剥落之余，唯存司马温公隶书“家人卦”及米元章书“琴台”二字，坡诗“我识南屏金鲫鱼”者此也。……玉壶园在钱塘门外，东坡咏南漪堂杜鹃花即此也。……石函桥在水磨头，白乐天《湖石记》云“钱塘一名上湖，北有石函”者是也。总宜园在德生堂西，摘东坡诗“淡妆浓抹总相宜”二字，御书堂匾。断桥在总宜园西，所谓“断桥斜日岸乌纱”者此也。^①

又同卷记徐州云：

城之东有护城堤，又有黄楼旧基，即苏轼守徐时所建。苏辙有《黄楼赋》，至今称道。^②

由这些记述，可推知崔氏以及当时朝鲜文人在中国传统诗词文学方面的知识是丰富而广博的。高丽及朝鲜长期作为中原王朝的藩属国，尤其是元朝与高丽、明朝与朝鲜，在政治上均正式确立宗藩关系，使得包括诗词在内的中国文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渠道十分通畅，甚至可以说当时朝鲜文人的知识世界实际上与中国文人的差别是非常有限的。

其二，崔溥对于当时中朝外交使节往来所产生的诗词文学作品，同样非常熟悉。如《漂海录》卷2载其在杭州：

有一人来问曰：“景泰年间，我国给事中官张宁奉使你国，做却金亭诗《皇华集》，你晓得否？”臣对曰：“张给事到我国，著《皇华集》，其中题汉江楼诗‘光摇青雀舫，影落白鸥洲。望远天疑尽，凌虚

^①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第98~99页。

^②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第122页。

地欲浮’之句尤称籍。”其人喜形于色，又云：“张给事致仕在家。家在嘉兴府之海盐县，距此百里。张公到此杭城，闻朝鲜文士漂海来，欲问朝鲜事。留待累日，前一日回去。”问其人姓名，则乃王玠，系给事甥也。^①

同卷还记录了崔溥在嘉兴府西水驿与驿丞何荣谈诗事：

荣另将菜馔、干鸡、八带鱼等物以赠，曰：“我朝郎中祁顺、行人张谨曾使朝鲜，著《皇华集》，国人靡和，徐居正居首列也。其诗有曰：‘明皇若是三朝事，文物衣冠上国同。’今见足下，诚千载一遇，蒙不弃，复承和诗，谨奉薄礼，少助舟中一膳，希目入幸甚。”臣曰：“祁郎中文章清德，人所钦慕，今为甚么官职？张行人亦任甚么职事？”荣曰：“祁郎中见贬为贵州石阡府知府，今已卒矣；张行人被罪，今充锦衣卫之军。”因问曰：“徐居正今为宁馨官职？”臣曰：“为议政府左赞成。”荣曰：“居正文章亦海东人物也。”^②

如果说白居易、苏轼等中国文人盛名远播于海东，高丽、朝鲜时代的文士对其诗词作品本就较为熟稔，故崔溥能举其作品与山川地理名胜相证发，盖题中应有之义，并不稀奇，那么在海难漂没之余、行囊空涩之际，崔氏对于张宁、祁顺、张谨出使朝鲜之作以及朝鲜徐居正的和诗名句，也都能信手拈来，这就体现了作为中朝外交使节唱和诗集《皇华集》的影响力，同时也说明了崔溥对于诗词文学绝非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全不经意。

其三，崔溥本人实亦擅诗。《漂海录》中多次记述了崔溥同中国文人或官员的诗歌往来情况，略列举如下：

（崔溥在桃渚所，把总松门等处备倭指挥使刘泽来问）问毕，因曰：“汝邦屡岁朝贡，义有君臣之好，既无侵逆之情，当遇以礼。各宜安心，勿生他虑。转送赴京，遣还本土。急促行装，不许稽缓。”即馈

^①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第 92 页。

^②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第 103 页。

以茶果。臣即做谢诗以拜。

（崔溥在绍兴府，总督备倭署都指挥金事黄宗、巡视海道副使吴文元、布政司分守右参议陈潭询问毕）总兵官三使相即馈臣以茶果，仍书单字以赐。……臣即做谢诗再拜。三使相亦起答礼致恭。又谓臣曰：“看汝谢诗，此地方山川汝何知之详？必此地人所说。”臣曰：“四顾无亲，语音不通，谁与话言？我尝阅中国地图，到此臆记耳。”

（崔溥在杭州）布政司大人徐圭、按察司副使魏福同坐驿宾馆，引臣等曰：“送你还国，你可放心好还。”臣即做诗以谢。

（崔溥在杭州，识李节，李节之友人某）袖《小学》一部，因节以遗臣，欲求诗。臣曰：“无功而受人之赐，是伤廉之地，敢辞。”节曰：“此人欲求一咏以为记尔。”臣曰：“做得诗不好，举得笔亦不好，以不好易人之好，非所欲也。”其人还袖去。李节谓臣曰：“交以道，接以礼，则孔子亦受是，何却之之甚？”臣曰：“彼人非是肯舍册也，意在得诗。则交不以道，接不以礼，我若一受，则是卖诗取直，故却之。”节唯唯而退。

（崔溥在嘉兴府西水驿）驿丞何荣以诗三绝见遗。臣亦和之。

（崔溥在姑苏驿，王、宋二御史）问毕，命外郎奉米一盘、豆腐一盘、面筋一盘以馈。臣作诗以谢。又有官人姓郑者求和约轩诗韵，臣即次之。

（崔溥抵京城诣兵部）有尚书余子俊坐一厅，左侍郎姓何、右侍郎姓阮对坐一厅，郎中二员、主事官四员连坐一厅。臣等先谒侍郎，次谒尚书，然后诣郎中主事官厅。郎中等不复问臣以漂来事，指庭中槐阴为题令做绝句，又以渡海为题令做唐律。^①

尽管崔溥的这些诗歌似均未传世，但上述记载足以证明其诗歌创作的实绩和能力。其中固有崔氏自称“若或有人先倡，不得不和耳”的情形，但远非全部。这与其所谓诗词为轻薄子嘲弄风月之资的观念构成了明显的冲突与矛盾。

三 传播场域与朝鲜文人复杂的文化心理

崔溥对诗词创作的否定性观念，与朝鲜文人及文学的实际状态乃至与其

①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第66、79、93、94、103、106、145页。

本人的知识世界及文学活动，均有矛盾。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性缘何产生，又折射出怎样的文化心理？

1. 程朱理学文学观的影响

朝鲜王朝以程朱理学为正统思想。理学在元代即传入高丽，到朝鲜王朝时期更是占据了主流地位，影响所及，士人皆以程朱之说为依归。这一点在前引崔溥与中国官员或士人的对答中已体现得非常明显。崔溥本人“博览载籍，该洽过人，尤邃于《易》。教导后生，亹亹不倦。海南为县，僻在海隅，旧无文学，礼仪亦荒陋。先生受室是邑，累年游处，以正论变陋俗。又得尹孝贞、林遇利二秀才及我先人，倒廪倾囷而诲之。三人以所学授徒，一乡翕然遂为文献之邦。宦游京洛，亦有英才朴闡等数十人从之游。谪端川，亦有权遇鸾等质疑请教。先生严厉廉介，居家未尝为簷石谋。出入台谏侍从，急于报国，奋不顾身，累进危言，力扶大义。自少抱经济之才，曾不一施。遭值否运，卒死非辜。士林痛惜”。^① 从这些记载看，崔溥一生讲学授徒和立朝为人，均流露出鲜明的程朱理学印记。而程朱理学思想中本就有着轻视诗文的传统观念，如程颐就屡屡表达过诗文害道的思想：

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或问：“诗可学否？”曰：“既学诗，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诗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当。”先生尝说：“王子真曾寄药来，某无以答他。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作甚？某所以不常作诗。”^②

在程颐看来，为诗为文就是“玩物丧志”的表现，崔溥所谓“嘲弄风

^① [朝鲜]柳希春：《眉岩集》卷3《锦南先生事实记》，《韩国文集丛刊》，第34册，第195页。

^② (北宋)程颐、(北宋)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18《伊川先生语四》，《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第239页。

月”的观念无疑滥觞于此。

朱熹虽然也说：“诗出乎志者也，乐出乎诗者。然则志者诗之本，而乐者其末也。末虽亡，不害本之存，患学者不能平心和气、从容讽咏以求之情性之中耳。”^①然朱子本就善作诗文，故其看待诗文创作的观念不似程颐那么极端，如其评张拭文云：“且世之所贵乎南轩之文者，以其发明义理之精，而非以其文词之富也。”^②相对而言，朱子此说没有完全否定诗文的价值，而是转而强调诗文所发明的义理的价值，是高明而通达之见。这也就提供了一个转圜的余地。《漂海录》中，崔溥一方面高言诗文害道，不断强调“我不学诗词”，另一方面却又但逢获赠礼遇均作诗以谢，照写不误，并不构成内心冲突。

2. 弱势文化的自我维护心态

高丽、朝鲜两朝长期作为中原王朝的藩属国，以事大为基本国策，东国士人对于中原文化的仰慕和欣羡也成为其基本的文化心理。但事实上，从高丽后期至李氏朝鲜时代，随着与中原王朝外交关系的变化，东国文人面对中国文学的强大影响时，其心态已由单纯地模仿学习向更微妙复杂的层面发展。具体到崔溥《漂海录》中所体现的轻视诗词，也应置于这一宏观背景中进行考察。

诗词文的创作本就是中原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环，它们既与科举有关联，又是文人的基本表达工具，更成为外交使节往来过程中的交流手段，《皇华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朝鲜士人在诗词创作方面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渴求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学习和效仿，对于杜甫、苏轼等中国著名文人有强烈的崇敬意识，且从高丽朝的李奎报、李齐贤到朝鲜朝的徐居正等，不乏优秀的诗人。另一方面，相对于中原王朝，二者的诗词文学地位显然是悬殊的。是以东国文人在慕华心理之外，又必须寻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弱势文化在面对和接受强势文化时，常常会有一种隐含状态的自我维护心理，以达到更平衡的自我认同。就崔溥《漂海录》而言，其作为朝鲜文士，不断向明朝官员及文

^① (南宋)朱熹：《朱文公全集》卷37《答陈体仁》，《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21册，第1653~1654页。

^② (南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53《答胡季随》，《朱子全书》，第22册，第2514页。

人强调诗词“玩物丧志”的一面，实际上很可能有着潜意识中的文化维护心理。崔氏所谓“我不学诗词”“嘲弄风月之资”等语，与其说是一种文学观念，不如说是以一种“非不能也，乃不为也”进而“不屑为”的姿态对自身弱势文化境地进行的自我安慰与维护，前引程颐等诗词害道的理学文学观则成为其有力的支撑。这其中或多或少也隐含着在文学和文化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朝鲜文人强调民族本位性、构建并塑造自身文化特殊性的努力。就程朱理学而言，作为宗主国的明朝和作为藩属国的朝鲜，均视其为正统，而朝鲜文人则极力强调朝鲜程朱理学的纯粹性，并引以为傲，进而寻求相对于中原王朝文化的心理优势。这种心理学上的保护性错觉，就是为了缓解文化弱势的焦虑情绪而产生的心理反应。^①

兹另举一例。清代乾隆年间朝鲜文人洪大容、金在行（字平仲）随朝鲜使节到北京，与杭州来京应试的举子潘庭筠（字兰公）、严诚（字力闇）以及浙江解元陆飞等会面笔谈多次，后洪大容将所谈汇为《乾淨衝笔谈》一书。其中记载与严诚的一次谈话云：

平仲以纸请书画。力闇曰：“兽蹄鸟迹交东国。”余曰：“前有李牧
隐先生入中国，与人唱酬。有人戏曰：‘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李
即对曰：‘鸡鸣犬吠之声达于四境。’其人叹服。今日言与此相反。”^②

在这场对话中，“中国”和“四境”构成了明显的两极，而洪大容借李闇之语将“中国”与“四境”这一组具有文化象征内涵的词语，转化为“兽蹄鸟迹”与“鸡鸣犬吠”的对照，其实就是试图抹去其夷夏对指的文化意蕴。

传播是社会关系的体现，文学传播也不例外。朝鲜文人这种“对权威地位的隐含需求”，^③正是两国政治与文化的复杂关系的折射。

事实上，不仅有诸如崔溥的轻诗词观，朝鲜文人对两国语音声调差异性

^① 参见〔英〕戴维·莫利、〔英〕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司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44页。

^② [朝鲜]洪大容：《乾淨衝笔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24页。

^③ [法]阿莱克斯·穆奇艾利：《传通影响力——操控、说服机制研究》，宋嘉宁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第45页。

的反复强调，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对其文化弱势的一种开脱。高丽、朝鲜两朝的官方语言文字均与中原王朝一致，这对文学与文化传播本是重要的便利条件。然而，当谈论填词创作时，朝鲜文人却经常强调中国与朝鲜缘于地理分别而在语音声调上具有差异性。如：

吾东方语音与中国不同，李相国、李大諠、貌山、牧隱，皆以雄文大手，未尝措手。^①

敝邦音调有异，不惯此作。^②

客曰：“乐府非人人可能，况东方自古无雅乐，子之为乐府，不亦滥乎？”余曰：“凡所谓乐府，必得中气然后可也。东坡生长于蜀，所偏只腭音，欲谐而未谐者，气颓然也。吾东声音，已偏于齿，何能普也？只依方音之平调、羽调、界面调，要不失五音，则何不可之有？”^③

这些表述强调的都是音调差异导致了高丽、朝鲜士人无法像中原文人那样熟练掌握四声，故填词词律不能精审。更有甚者，将整个东国文学均置于所谓声音因素影响之下。如韩致齋《海东绎史》载：

高丽之学，始于箕子。日本之学，始于徐福。安南之学，始于汉置刺史。其后数千年间，其文皆不免于夷狄之风，窘竭鄙陋，不足以续圣教者，盖其声音不同，其奇妙幽玄之理，非笔舌之可传，故不相合。^④

然而这种差别是否如其所言有想象的那么大，是值得怀疑的。元明以后的中国文人在诗词创作中，同样面临语音与唐宋已有较大变迁的问题。即使在唐宋时期，也有方言入词等现象。因此，朝鲜士人对音声差异的极度强调，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是其面对强势文化找寻的一个心理支撑点。

① [朝鲜]徐居正：《东人诗话》卷上，《高丽汉诗文学集成》，民昌文化社，1994，第446~447页。

② 申光汉《玉楼春》词注。参见[韩]柳己洙《历代韩国词总集》，韩信大学校出版部，2006，第97页。

③ 李衡祥《巫山一段云》词注。参见[韩]柳己洙《历代韩国词总集》，第200页。

④ [朝鲜]韩致齋：《海东绎史》卷59《艺文志·杂缀》引《原始秘书》，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下册，第273页。

3. 观念的场域呈现

就朝鲜士人面对中国文学的文化心理而言，阐释的维度自然是多元的，而其中场域这一维度却常常容易被忽略。“传播的背景（setting）或者语境（context）作为传播要素的意思是：每一则信息都是由一位发送者或编码人生产的，都有一个背景或语境框架。背景或语境也可被视为环境，即物质或心理的‘场域’，传播的信息在此被编成或被接收”。^① 场域可能影响话题的特征和说话的主题。如崔溥的前述观念就是在一种特殊的场域中发生，并在同样特殊的场域中被记述的。

崔溥对话的对象是明朝的地方官员或文人，即两者之间是藩属国官员与宗主国官员或文人之间的对话。这一特定的交流场所衍生的特定的语境意识，影响到《漂海录》中崔溥的身份定位和观念呈现。不难看出，《漂海录》中崔溥的形象是臻于完美的。例如当他抵达浙江沿海遭遇海盗时，手下劝其更换丧服，具冠带，以示官人之仪，崔溥予以拒绝，并谓“释丧即吉，非孝也；以诈欺人，非信也”；^② 登岸后又反复告诫随行众人云：“我国本礼义之国，虽漂奔窘遽之间，亦当示以威仪，使此地人知我国礼节如是。”^③ 到北京后向明朝皇帝谢恩时不得已更换吉服，礼毕即复丧服。这种重礼义尊孝道的信念当然是崔氏的本心，但在与明朝官员或文人的交流中，这一点被尤加强调，未免就有特殊的意味了。可见就身份定位而言，崔溥始终表现出作为一个朝鲜官员的敏感性。在论及诗文等文人之间的话题时，这种场域的边界自然也是存在的，故在与中国文人的对话中，崔溥作为朝鲜文人的自我定位、认同以及相应的观念，自然会得到明显的强调。

需要注意的另一个场域是《漂海录》的书写语境。《漂海录》一书是崔溥回到朝鲜守丧期满后，得到朝鲜成宗的召见，承王命记述而作的。由“说”而“作”，此时生成了第二层面的对话对象，即隐含的读者。奉王命而作，其预期的阅读对象首先是朝鲜国王，这是由君臣关系构成的书写语境。此外，作为一名朝鲜的士人与官员，本国同僚自然也是潜在的读者；而作为一部记录自己在异国的行程与活动的著作，其对象国的文人官员亦是潜

^① [美] 迈克尔·普罗瑟：《文化对话——跨文化传播导论》，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39页。

^②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第51页。

^③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第54页。

在的读者群。这就构成了一个特殊的书写场域，阅读对象复杂，包含对上、对内、对外多重指向，各有侧重。进而这多重指向共同构成了一个合力，促使作者的话语指归努力要去表现自己是如何维护朝鲜国尊严的。从书中非文学活动的记述亦不难看出这一意图。如崔溥一行经过健跳所时：

有一人以丙午年登科小录来示臣，曰：“此吾的登科第榜录也。”又指点录中张辅二字曰：“此吾的姓名也。”因问曰：“你国亦贵其登科者乎？”曰：“然。”曰：“我国制，草茅士登第者，皆官给俸禄，旌表门闾，刺史亦书赐进士及第某科某等人”云云。引臣至其家，则其家前街果以雕龙石柱作二层三间之门，金碧眩曜，其上大书“丙午科张辅之家”之标。辅盖以己之登第夸示臣。臣亦以浮诞之言夸之曰：“我再中科第，岁受米二百石，旌门三层，足下其不及于我矣。”辅曰：“何以知之？”臣曰：“我之旌门远莫致之。我有文科重试小录在此。”即拨示之。辅于录中见臣职姓名，下跪曰：“我殆不及矣。”^①

又崔溥及其随行人等都得到明朝皇帝的厚赐，崔告诫随从云：

帝之抚我赏我，都是我王畏天事大之德，非汝等所自致。汝其勿忘我王之德，勿轻帝赐。^②

在这两场对话中，崔氏固然可能是实录其事，但字里行间的情绪与心理，既有代表朝鲜官员的傲骨，又有向朝鲜国王表达的恭敬之意。从场域的角度来反观崔溥《漂海录》中所载对诗词创作的某些否定性观念，可推测其或许并不全然代表崔氏一贯以来的主张，而是在与明朝官员、文人的现实交流中，在与潜在读者的想象交流中，一种有意图的表达，是一种强调某种倾向的观念呈现。这种推测似乎可以解释崔溥诗词观与其文学实践之间的矛盾。

场域对观念产生的偏移效果可另举一例。《乾淨衙笔谈》记洪大容与潘庭筠、严诚谈及中国服饰，洪谓：“余入中国，地方之大，风物之盛，事事

①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第71页。

②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第157页。

可喜，件件精好，独剃头之法看来令人抑塞。吾辈居在海外小邦，坐井观天，其生靡乐，其事可哀，惟保存头发为大快乐事。”^① 这个敏感话题令潘、严二人相顾无言。在这一与中国文人对话的场域中，剃发、留发隐含着夷夏之辨的文化语境，故朝鲜文人对清朝汉族文人的“痛点”津津乐道，也恰好印证了朝鲜“小中华”之誉。但洪氏在事后记述对陆飞、潘庭筠、严诚三人的印象时却说：“三人者虽断发胡服，与满洲无别，乃中华故家之裔也。吾辈虽阔袖大冠，沾沾然自喜，乃海上之夷人也。其贵贱之相距也，何可以尺寸计哉！”^② 在这种私下记述的场域，自然就较少场面话与夸耀比较之语了。

上述所论或许说明了场域与语境对于观念的微妙影响。尽管“文化不是权力，……文化是语境”，^③ 但是人们在语境中的行为与态度都是文化权力关系的缩影与结果。上文所引的对话的语境，就是文学传播的一个微观场域，其所透露出来的信息不在于观念本身，而是特定场域下的文化权力关系及土人的文化心理。

四 结语

崔溥在《漂海录》中表现出来的诗词观念与文学实践的矛盾性是一个比较微观的问题，本身并不十分突出，毕竟崔溥并不以诗词文学而著名。然而本文的意义一是在于对《漂海录》的研究极少从文学的角度切入，这一尝试自然有其价值；二是从崔溥诗词观与文学实践的矛盾处折射出的文学传播过程中朝鲜文人面对中国文学的某些复杂心理，可为考察中国文学的传播、影响以及朝鲜文人的受容、反馈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

高丽、朝鲜两朝文学的发展，无不深受中国的影响，中国文学传统是高丽、朝鲜文学发展的参照系甚至驱动力。海东文人的文学观念即便是出于对其本位性与独特性的强调，也常常能在中原文化中找到渊源和依据，例如崔溥的轻诗文观念便受到程朱理学文学观的影响。以中原王朝为代表的东亚大

^① [朝鲜] 洪大容：《乾淨衙笔谈》，第 12~13 页。

^② [朝鲜] 洪大容：《乾淨录后语》，载氏著《乾淨衙笔谈》，第 133 页。

^③ [美] 迈克尔·普罗瑟：《文化对话——跨文化传播导论》，何道宽译，第 133 页。

陆文化，相对于朝鲜半岛文化而言，无疑是居于强大的中心地位的，这就构成了强势的、输出性的一方与相对弱势的、接受性的另一方，两者之间的关系亦是颇为微妙的。如中朝文人之间的赠酬唱和，除了诗文会友、把笔言欢，常常还有着明显的斗艺较胜的意思。洪大容《乾淨衡笔谈》记载朝鲜金在行与严诚、潘庭筠诗歌唱和云：“平仲即席，次清阴韵赋一绝。两人看毕，即次之，皆援笔疾书，颇有较艺之意。”^① 有较量就有试探、有藏拙、有夸饰，个体的较量更可能延展为双方整体上的文学与文化较量，或巩固自己的文化位置，或找寻自己的文化位置。从整体的层面来看，上文所论轻诗词观念的表露与对音韵差异的强调就不仅是某种观念或学理，也是一种情绪和心态。

在讨论和考察高丽和朝鲜王朝的文学与文化时，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参照物，始终是客观存在的。至少晚清以前，中国文人在评诗论词时，并不需要以域外文学作为参照，但海东文人关于诗词文学的任何观念、言说与书写，可以说都无法避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参照系。这是一层更为宏观的场域与语境，而恰恰也是认识高丽和朝鲜王朝文学的关键之一。

A Study on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Korean Literati and the Field Presentation: Focused on Cui Pu's Poetry Conception in *Records on Ocean*

Fan Kui

Abstract Cui Pu, a Chosǒn scholar, drifted to Taizhou of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Hongzhi Period of Ming Dynasty. *Records on Ocean*, which Cui wrote after returning to his country, showed some conceptions of despising poetry writing. But actually he learned much about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was good at writing Chinese poems. In addition, he was acquainted with the poems wrote and exchanged by the envoys between China and Chosǒn. The contradiction,

^① [朝鲜] 洪大容：《乾淨衡笔谈》，第5页。

which can be understood from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reflected the literary communication and influence from China to Chosǒn, and especially the complicated cultural psychology of Chosǒn literati. It is important that researching Sino-literature in ancient Korea on the basis of comparing with Sino-literature and specific fields.

Keywords Cui Pu; *Records on Ocean*; Poetry Conception; Cultural Psychology; Fields